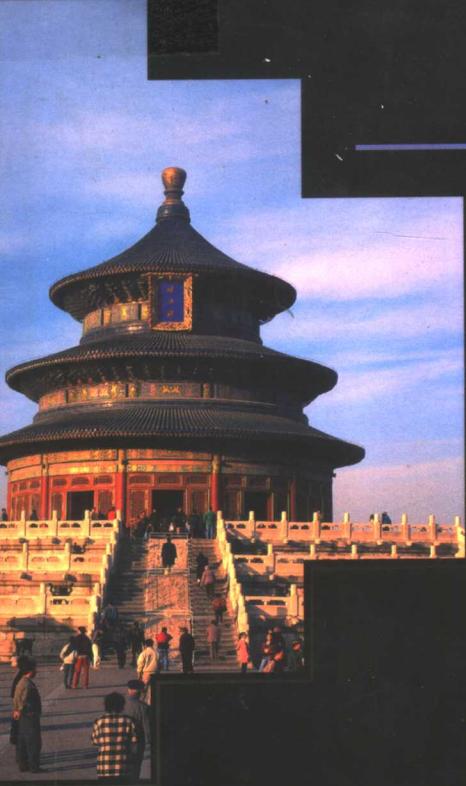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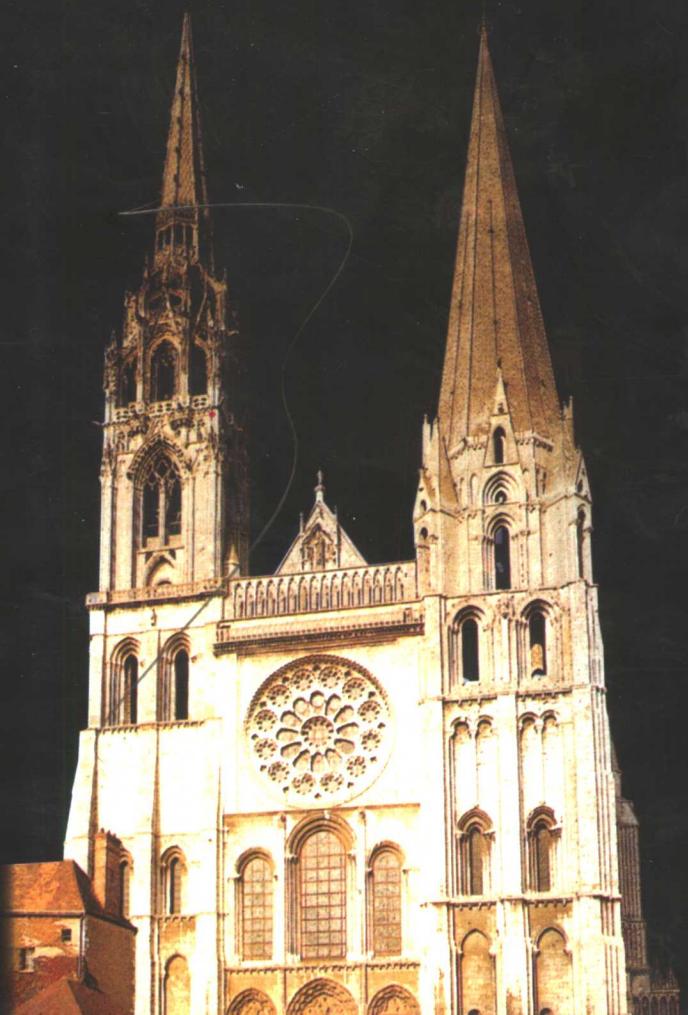


——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方
建筑的文化阐释

东西方的 建筑空间

——建筑师文萃
JIAN ZHUSHI WEN CUI

王贵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东西方的 建筑空间

——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方建筑的文化阐释

王贵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东西方的建筑空间：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方建筑的文化阐释 / 王贵祥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06-4406-8

I. 东… II. 王… III. 建筑艺术－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中世纪 IV.TU-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79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75 插页 5 字数 37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6000 册 定价：45.00 元

再版序言

这是一篇写于十余年前的文字，其基本的架构是笔者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在阅读了大量西方建筑历史与文化著述，并聆听了爱丁堡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威尔逊先生的一系列讲座后，结合自己在中国传统建筑方面的研究积累而写作的，最初是一个英文稿，回到国内后，又在清华大学加以进一步的研读，在导师吴煥加先生的指导下，重新用中文撰写而成。

撰写这样一篇文字的初步动因大约有两个，一个是笔者在阅读中发现，许多西方建筑史论著作，其基本的思路是欧洲中心论的，即欧洲是世界建筑的中心，欧洲建筑是建筑历史的主流，其它文化中的建筑，都是建筑史上的旁枝左权，是“非历史”的，这对于一个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人来说，莫过于是说，我们毕一生精力所从事的研究，不过是一些旁门左道的事情；另外一个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中，充斥了一种对于中国数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否定气氛，这样一种否定，细究其原因，大概与五四以来对于中国文化所持的基本态度不无关联。似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负上全部的责任。这显然也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

正是出于一种为中国文化与传统正名的思想，在英国研读的时候，我选择了中西建筑文化比较研究这一较为困难的领域，另外的原因也在于，导师威尔逊先生恰好对世界范围内的传统建筑与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的麾下汇聚了来自许多国家和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建筑历史方面的研究生与进修人员，其中不乏后来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学者。这样一个有着浓郁学术氛围的环境，对于自己的思考是颇有助益的。

当然，这是一个荆棘丛生的研究道路。对于中国与西方这样两个伟大文明的建筑历史做一个比较，哪怕是最为基础性的比较，都只会是十分宏观而粗线条的。因为，其中每一种文化的建筑中，都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正因为如此，在一开始的讨论中，我就将西方建筑限定在中世纪基督教建筑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同时，也相应的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陈述，限定在以儒教为背景的明堂及其衍生建筑和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建筑上，因为这三支建筑历史脉络，都是各自独立发展，并受到了各自历史与文化深刻影响的建筑。

我们都知道，西方历史上，建筑的发展受到强烈的理性因素的左右，从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的阿尔伯蒂，然后，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了现代西方建筑。这是一个理性成份十分浓厚的建筑文化体系。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如果不对西方建筑理论史上这些重要学者的富于理性色彩的理论思考加以联系，是不可能真正触及到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中世纪的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神学，上帝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人们的思维中充满了对超自然力的迷惑、恐惧与敬畏，这一时期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建筑师个人或主观思维的产物，而是由一系列符号性的文化象征所限定了的东西。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以后，一种对于教堂建筑之平面或立面的宗教象征性探索也远没有停止。

相应的情况是，数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建筑，虽然也有儒家实用理性的内在品质蕴含其中，但基本的文化传承却并不那么理性。古代中国人对于建筑的认识，虽然也兼顾使用与舒适，但基本的建筑思考，却被牢牢地限定在传统思维的框架之内，如将建筑与宇宙的图式加以契合，使建筑充分体现儒家礼制的规范，建筑的选址受制于由超自然力所左右的风水理念，建筑中充满了大量象征性符号，而其建筑空间的基本构成，也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方位象征图式密不可分。同一时期的佛教建筑，无论是汉地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都没有摆脱受到宗教性超自然力信仰的左右，其情况与欧洲中世纪的十分相像。

换句话说，西方中世纪建筑与传统中国受到佛教影响的建筑及佛教建筑，都不是一些由十分个性化的建筑师经过理性思考而创作的建筑作品，真正创造这些建筑的是积年弥久的文化传承本身，是传统思维中的种种象征性追求的驱动。这样一些建筑与世界上许多曾经深陷宗教迷惘与朦胧中的传统建筑一样，其基本的内在动因，是寻求与超自然力的契合与交通。而正是这种未经人类理性雕琢的传统建筑文化，才最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文化中最深层次的思维习惯，从而也最深刻地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特点。而恰恰是在这一层面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化，是站立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这就使得所谓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传统化落后论变得不值一驳了。

当然，文化的交流，乃至文化的混同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同文化间互利的进步，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正是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东方人从西方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和西方人从东方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都汇聚在为人类造福的现代文明之中了。但是，毋庸讳言的是，这同时也是一种悲哀。我们不可以想像，在若干年之后，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就只存在有一种文化，一种充满科学与理性的文化，一种排斥所有传统与历史的文化，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操着同样的语言，用着同样的器皿，住着同样的房屋，有着同样的行为举止。这将会使得这个世界变得多么单调而枯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单调与枯燥带给我们的精神压抑。

事实上，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一个时期中，主要的建筑著述，都是围绕某种对于宗教象征之阐释的思路展开的，文艺复兴之后，建筑理论思考重归理性的轨道，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试图在建筑与宇宙图式、建筑与宗教神学之间寻求某种关联。启蒙运动以来，这样的声音渐渐被淹没在世界性的理性大合唱中。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化哲学与符号学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一种重新探索各自文化传统中的奥秘及其与早期宗教思维之关联的研究也悄然兴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建筑史论著中，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著作。

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其主流的和基本的方向无疑应该是一种基于技术与艺术层面上的理性与科学的探索。因而，对中国建筑之结构、构造、造型及装饰的研究，还远没有到应该终止的时候。但是，科学的研究的精髓应该在于探索新的未知的领域，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本书的这一研究，其原初的目标之一，恰恰就是想摆脱颇受西方话语影响的人云亦云的状态，进入这样一个未知的领域，在这种研究中，比较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进一步加深对古代中国建筑的理解与认识。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基于技术与艺术层面上的理解与认识，或许，可能是一个可以从更深刻层面上揭示古代中国建筑之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且，是一个十分粗浅而不完备的开始。许多问题仅仅是提了出来，并没有来得及加以深入的阐释，一些问题的结论，可能还有待商榷。但任何事物总是需要一个开端的。笔者真诚地希望，围绕传统中国建筑之内在文化象征及发展动因的研究，会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从而引发出一些具有拓展性的研究成果。此外，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是一次中西方建筑历史与文化之旅。读者从中或能够得到某种启发，对传统建筑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与关注，则是笔者衷心的所愿。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对这本小书的再版。这使得在现代社会中西方强势话语下的这一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而呐喊的孱弱的声音，能够再一次引发学界同道的思考。即使这思考是批判性的，只要能够由此而加深对传统中国建筑与中世纪西方建筑之间内在本质同异的了解，也足令笔者感到欣慰了。

2005年11月10日

引言

这是一篇基于泛文化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的有关历史建筑空间理论方面的探索性文字，尽管其中涉及了许多不同的背景性文化的内容，但是，笔者的初衷仍然是试图通过这些与建筑空间的观念与形式有所关联的种种文化现象，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建筑空间生成与发展的种种动因，以期发现造成不同文化间建筑的相同与不同的空间形式的内在原因，从而为这种空间形式及其演变方式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找到一种可能的诠释。

就历史文化而言，在世界文明史上，大约有四种文化体系，具有比较广泛与深远的影响。一种是基于环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埃及、古代希伯来以及古代希腊与罗马文化基础之上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体系；一种是基于古代西亚特别是阿拉伯半岛与波斯文化基础之上，并受到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犹太—伊斯兰教文化体系；一种是基于古代南亚次大陆主要是印度文化基础之上的佛教—印度教文化体系；另一种是基于古代东土华夏及西域包括印度、波斯等文化基础之上的儒教—道教—佛教文化体系。这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文化，第四种即是熟知的中国文化，这是两个截然异趣但又平行发展的文化，也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两种文化。

关于位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行发展，原本就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久已被一些西方学者所关注的问题。这两种文化间所存在的令人惊异的平行性，首先可以从中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得到印证。

当中国人处于上古三代的时候，西方人也沉浸在由爱琴文化及周围一些先进文明所包围的襁褓之中。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与西方的希腊时期，不仅在时间上恰相吻合，而且同是一些城邦或诸侯小国的战乱纷争，也同是一个哲人辈出、文化奠基的时代。欧洲人的罗马帝国与中国的秦汉帝国，也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并且创造了同样灿烂的文化。同是在公元之初，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都各自面对了一个外来的宗教——来自西亚的基督教与来自印度的佛教，只是罗马人在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将基督教宣布为“国教”，而中国人却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的国策，并逐渐将外来的佛教放在了与中国固有的儒学及后来渐起的道教大略同等的地位。

随之而来的是，古代社会大陆两端的这两个大帝国都遇到了来自游牧部落的蛮族入侵，东西罗马的并立与南北朝的对立，也是一个颇为相近的现象。八世纪前后的隋唐帝国的统一与西欧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表面上的统一也并行了一段时间。十一世纪之后，西方渐渐萌生了民族国家，中国也渐渐稳定了大一统的局面。此后的发展道路上，中西方渐渐发生了较大的歧异，但十六世纪西方文艺复兴的兴起，与中国明代的一度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如同时悬挂着的东西两盏历史明灯，光耀一时。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人与欧洲人，彼此间仅有一些隐约的支离破碎的消息往来，直到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间，随着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处于清王朝时代的中国人开始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有关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渐渐地被欧洲人所了解。

大约在十七世纪时，欧洲的一些学者与贵族们就注意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并对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文化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如莱布尼茨、沃尔弗以及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腓特烈一世、腓特烈大帝等。他们对中国的哲学、政治、艺术、伦理与文学等都有所关注。在1693年时，勃兰登堡—普鲁士甚至还采用了中国的文官制度。见《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前言》秦家懿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北京。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一些诗人与哲学家也将目光转向中国，这其中有着名的歌德、席勒等人。这一时代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充满了颂扬与肯定。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事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一度在西方占到了主导地位。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在他所著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开始将世界历史上存在的文明归纳为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八种不同的类型。但是，尽管斯宾格勒不主张欧洲中心论，却认为上述八种文化中，除去西方文化之外的其它七种都已经死亡，只剩下一些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而二十世纪著名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则将历史上存在过的文明，分为了21有时又分为26种之多。但是，他继承了斯宾格勒的衣钵。虽然在表面上他也反对欧洲中心论并认为各种文明“在价值上是相等的”，却认为现存的五种文明中，有四

种正在走向死亡，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保持着“创造性的活力”。齐世荣：《德意志中心论是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结果——评〈西方的没落〉》见《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5年北京

与文化形态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同时开展的是建筑历史方面的比较性探索。早在十七世纪末与十八世纪初，由维也纳巴洛克建筑师爱尔拉奇撰写的第一部带比较性的世界建筑历史专著《历史建筑概况——古代与现代各国最著名建筑综览》中，就将埃及、中国与伊斯兰的建筑，第一次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著名英国建筑历史学家弗莱切尔编著的世界建筑历史专著《比较的建筑历史》中，却有了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子。在弗氏著作的早期版本中，一直有一棵颇具争议的“建筑之树”。在这棵树上，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现代，形成一个以欧洲建筑历史为主干的树干，中国建筑、印度建筑、日本建筑、伊斯兰建筑、南美建筑等，都不过是这棵历史之树的旁枝左权，并被打入“非历史建筑”的另册。

然而，历史的真实是怎样的呢？难道世界文明的发展历史，真是围绕着欧洲文化这根“树干”去旋转的吗？欧洲以外的其它许多曾经一度辉煌过的文化，难道都是一些原本不名一文的东西吗？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究竟是依据了怎样的力量，才逐渐形成各自文化的千姿百态？又是怎样才达到了各自历史的灿烂辉煌？这些都会令治文明史、艺术史及建筑历史的学人们萦绕心怀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不带文化偏见的话，从一些很基本的材料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文明的诸种形式，都是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文明的早期，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都走了十分相近的路，例如，都产生过类似的原始空间观念，有类似的神话空间表述形式，有相近的关于空间的巫术礼仪形式甚至有十分接近的建筑空间表达形式。随着文明的发展，由于文化与宗教的背景不同，不同文化间在基本的空间模式观念上，在基本空间图式及原型空间的选择上，在空间轴线取向及主导方位确定上，在宇宙模式观念的形成上，在神圣空间的性质与内涵方面，渐渐发生了歧异。如此，便发生了空间观念上与空间形式上的种种差异。

正是基于如上的分析，我们从上述四种主要文明的其中两种——以犹太-基督教体系为主的西方文化与以儒教-道教-佛教体系为主的中国文化出发并将其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层面上，进行比较分析，力

求找出两者间各自的历史建筑空间之形成与发展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探求其中可能蕴含着的内在规律。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建筑与时间大略相当的中国的儒教与佛教建筑方面。当然，基于对中国建筑的特殊性的认识，我们将中国建筑的时间跨度做了适当的延展，同时，也因分析的需要，而将一部分笔墨移向与中国佛教建筑有较多关联的印度文化方面。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是将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进行比较分析。因为，没有相当的理论与文史的功力，是不可能对这样三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文明，同时进行比较研究的。何况，印度文化的扑朔迷离与语言上的巨大障碍使得这一可能变得更加渺茫。即使在中西建筑的比较分析中，笔者也未能涉及所有的领域，如中国建筑空间中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方面，就囿于篇幅与资料占有所限，而没有充分触及。而对西方建筑，笔者更是将之限定在一个十分确定的范围之内。

建筑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西方建筑史学是随着启蒙运动与理性崛起并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而逐渐形成的。早期的西方建筑史学是艺术史学的一个分支并与在近代兴起的考古科学密切相关。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十分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国度里，关于建筑之历史的学术兴趣，可能在更早的时代里就曾经出现过。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以历史上某一时代的城市与建筑为主要题材的记述性著作，如北魏的《洛阳伽蓝记》、唐代的《两京新记》及唐《酉阳杂俎》中的《寺塔记》、宋代的《东京梦华录》、清代的《历代宅京记》等等。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历史研究，在我国还仅有不足百年的历史。

在中国的建筑历史研究中，最初主要着力于从历史文献中发掘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随着欧风西渐，以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为代表的学界前辈们渐渐将西方考古科学与逻辑推理的方法引入了建筑历史研究，从而建立了现代中国建筑历史科学的体系，使中国建筑史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深厚学术内涵的学科体系并使之在世界建筑史学领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建筑史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城市史、中国园林史、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建筑史等多个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在科学技术史、建筑艺术史、美术史、中西建筑比较研究、中日建筑比较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建筑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西域建筑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由目前的学科发展来看，建筑历史研究已经渗透到许多不同的领域。例如，在考古学、历史科学、美学、艺术史、美术史、文化史、城市史、科学技术史、宗教史、民族史、神话学、人类文化学、跨文化比较研究、文物建筑保护科学以及图像学、历史-解释学、心理学、符号学、现象学、艺术发生学等许多不同的甚至十分玄奥的学科领域中都有人从事或涉及到建筑历史学科的研究。还有更多的从事科学普及事业的人们，把建筑的历史与文化繁荣和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的研究兴趣主要放在历史建筑之“是什么”方面，大量的建筑测绘图录、建筑考察报告、关于建筑的历史沿革分析以及建筑发展历史的论述都属于这一方面。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在进一步深入中，还有许多未曾涉足的领域。围绕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需要一批学者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近年来，从一些新的角度或应用新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中国建筑历史做进一步的系统整理与阐发是国内建筑史学界的大事。

此外，随着学术思想的进一步放开，学术氛围的进一步活跃，在国外学术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关于历史建筑之“为什么”方面的研究也正在日益展开。比如，关于建筑之“意义”的研究、关于空间的“质”的研究、关于空间“场所”的研究、关于空间“路径”与“终点”的研究等方面，已经逐渐渗入中国建筑历史学科之中。在近年来兴起的“风水”热中，特别是那些最初在“风水”研究领域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们也多是在力求解决历史建筑及其环境之“为什么”的问题。

目前，关于建筑之“为什么”方面的问题，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展开的研究领域，对于这一领域的整体的面貌与近期的发展，还很难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一般地说，在这一领域中，人们最关注的主要是建筑中所内涵的“意义” Meaning 问题，如挪威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诺伯格·舒尔茨 C.Norberg-Schulz 关于建筑的意义的研究，是中国建筑界所熟知的事情。他的笔端触及到古埃及、古罗马、中世纪基督教以及近代与现代的建筑，其着眼点在于建筑之意义内涵的一般性规律的探索。

当然，对古罗马建筑的穹顶、对伊斯兰建筑的造型、对印度神庙建筑、对中国藏传佛教喇嘛塔、对中国园林的山水空间等一些独到而特殊

的方面，所内蕴之意义的研究，在国外学术界也有人进行了专题的研究。研究建筑之象征性内涵，不仅仅涉及建筑的“意义”问题，也触及建筑发生学与解释学方面的问题，诸如建筑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及其解释等等。在这方面对中国建筑之内在的象征性及意义的研究还刚刚在起步阶段。

从事东西方建筑的比较研究也往往是着眼于东方与西方建筑之间各自生成的内在原因方面。例如：何以西方建筑以石结构为主，而东方建筑，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何以西方建筑多追求大体量的形体与空间，而东方建筑仅仅追求适度的空间与体量，如此等等的问题，如果细究起来，仍然与建筑的意义与象征性等一般性的问题有所关联。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中国也正在兴起之中。

其实，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艺术史研究以及人类文化学、神话学、宗教学研究中，早已有人对历史上的诸多艺术作品中所内涵的意义与象征性，进行了广泛与深入的研究。在艺术领域中，这一研究还渐渐衍生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图像学领域，即对某一艺术作品图像中所内涵的意义的研究。这是“一门以历史—解释学为基础进行论证的科学并把它的任务建立在对艺术品进行全面的文化—科学的解释上。”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序》中文版编者序杨思渠·范景中。霍格韦尔夫G.J.Hoogewerff定义说：“图像学关心艺术品的延伸甚于艺术品的素材，它旨在理解表现在或隐藏于造型形式中的象征意义、教义意义和神秘意义。”同上。在现代西方艺术史学领域，作为历史—解释学意义上的图像学已经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分支。

事实上，艺术史学领域的图像学研究，是与现代哲学的发展分不开的。如德国现代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研究，就对艺术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Panofsky在对图像学下定义时，曾经指出：“这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化征象史’或是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文化符号象征史。”在这一学科领域中，“艺术史学者必须尽可能多地运用与他所认为的某件艺术品或某组艺术品的内涵意义相关的文化史料，来检验他认为是自己所注意的该艺术品的内涵意义。”潘诺夫斯基还特别指出：“正是在寻求内在涵义或内容时，人文科学的各学科在一个平等的水平上汇合，而不是相互充当女仆。”出处同上。建筑历史科学，作为艺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必然会受到艺术史学发展的影响。上面谈到的对于建筑的象征性与意义的探索，归根到底，大

约也属于艺术史学中的图像学的领域，因而也可以归属为一门以历史—解释学为基础进行论证的学科。也许正是在这一领域中，建筑历史科学与艺术史学以及其它相关的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有可能得以在一个平等的水平上汇合。从这一角度上讲，关于建筑之“为什么”的研究，较之关于建筑“是什么”的研究，在整个学科领域中，应该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与迫切性。

本文在内容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着眼于原始空间观念的源起与形成，各种文化中所内蕴的抽象的建筑空间图式以及建筑空间因文化而异或者说建筑空间图式的文化抉择的可能原因。这一部分涉及了较多神话学、人类文化学、原始巫术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涉及了神话与建筑空间的形而上、宗教宇宙模式、不同文化中所尊崇的神秘图形及其空间意义等内容。这一部分大约可以归入建筑发生学的范畴。

第二部分是以分析的方式对基督教、中国佛教及儒教建筑的基本状况及演进的历史进行了描述。这一部分立足于建筑历史的发展，却又不同于一般建筑历史的研究。对其历史轮廓线的描述主要落墨于不同文化之宗教建筑空间的形成与演进方面。在这一部分中，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建筑、中古时代的中国佛教建筑及由儒教思想所确定的中国天子起居、祀拜与布政的空间，作为三个各自独立的体系，着重分析这三种建筑的基本的空间形态及其演变过程。这一部分还主要属于建筑历史学的范畴，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角度而已。

第三部分是本文所探求的一个重点，以期在前两个部分的基础之上，尝试着找出上述三种建筑空间体系各自的本质性特征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从而为三者间所存在的，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而形成的空间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找出一种合乎逻辑的可能解释。因而可以将之归为历史——解释学与文化比较学的范畴之中。

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方面，还不仅仅因为我们对于这两个建筑体系，较之对于其它建筑体系更为熟悉一些，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所了解的文化形态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彼此能够分庭抗礼，而又各具个性特征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两种文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恰当地结合，关于这一点似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取得了共识。

比利时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曾经说过：“近代科学的起点确实是在十七世纪，即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时代，但这同时也是欧洲面对中国文明与之相争的时代，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中文版序言 曾庆宏·沈小峰译普里戈金在他的研究中，总是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在天平的两边来进行分析，说明了他对这两大文化的同样重视。

伊·普里戈金还推测说：“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出处同上第57页如我们所知道的，伊·普里戈金所从事的研究，是在为由于人类与自然之间日渐加深的矛盾而陷入困境的现代西方文明，寻找解救的良方，而他所追求的正是“把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联盟”出处同上译者序。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伊氏的见解有相近之处，则基于上述这一目标，我们所进行的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建筑空间的比较研究，就不仅仅是建筑领域内的纯学术性探讨而是具有了更为深刻与现实的意义。

目 录

1 再版序言

1 引言

上篇：空间图式及其文化抉择

3 第一章 原初的空间

3 第一节 空间的启蒙

8 第二节 神话与空间

11 第三节 巫术与空间

21 第二章 数与抽象空间图式

21 第一节 圣神数字及其空间图式

35 第二节 空间图式的文化抉择

47 第三节 空间指向与主导方位

54 第三章 宗教宇宙模式

54 第一节 空间的形而上

59 1. 宇宙中心

60 2. 宇宙之柱

63 3. 天梯

- 64 第二节 河图·洛书·曼荼罗·圣十字架
64 1.十字崇拜
68 2.曼荼罗
70 3.河图·洛书
77 第三节 宗教宇宙模式
78 1.基督教宇宙模式
81 2.佛教宇宙模式
83 3.儒教宇宙模式

中篇：中世纪上帝·佛·天子的殿堂

- 87 第四章 中世纪基督教教堂建筑
87 第一节 从所罗门圣殿到基督教堂
87 1.摩西圣幕与所罗门圣殿
90 2.穿越通往至圣所的帷幔
94 第二节 前君士坦丁时期
94 墓窟、圣祠与初期基督教建筑
97 第三节 从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
97 1.巴西利卡——会众的空间
101 2.陵庙、洗礼堂与集中式教堂
105 第四节 加洛林与奥托时期
105 1.东西相对的半圆室
110 2.西部结构的形成
112 第五节 罗马风基督教建筑
112 1.环绕圣坛与歌坛的发展